

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

刘涵之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兰芷学人文库



兰芷学人文库

湘语音韵历史层次研究

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

周作人中庸思想研究

20世纪中国旅日文学研究

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

沈从文思想研究

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

汉语的位序变换

——「形容词+点儿」状补换位专题研究

责任编辑：王桂贞 装帧设计：吴颖辉



ISBN 978-7-81113-364-6



9 787811 133646 >

定价：23.00元

I206.6/187

2008

刘涵之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

兰芷学人文库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沈从文乡土文学的精神现象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沈从文置身于特定的文学场域,他的文学理想及文学实践的价值取向、美学旨趣;揭示了构成沈从文乡土文学书写唯美与功利矛盾的根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刘涵之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1113-364-6

I. 沈... II. 刘... III. 沈从文(1902~1988)

—乡土文学—文学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9275号

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

Shencongwen Xiangtu Wenxue Jingshen Lun

作 者:刘涵之 著

责任编辑:王桂贞

特约编辑:付 林

装帧设计:吴颖辉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21691(发行部),8821343(编辑室),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649312(发行部),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wanguia@126.com

网 址:<http://press.hnu.cn>

印 装: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32开 印张:9.25

字数:232千

版次:2008年6月第1版 印次: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ISBN 978-7-81113-364-6/I·46

定价:23.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总序

由湖南大学老校长胡庶华教授作词的湖南大学校歌有云：“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沧沧。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华与实兮并茂，兰与芷兮齐芳。楚材蔚起，奋志安壤。振我民族，扬我国光。”歌词中的“兰与芷”，出自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及《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喻指湖湘之优秀人才。

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的湖南大学，千百年来，这所学校为中华民族培养输送了无数优秀人才，为民族的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湖南大学所培养的不仅仅是一届又一届的合格学生，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过程中，也培养和造就了许多青年教师，使他们逐渐成长为学校师资队伍中的主力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兰芷”、“荃蕙”，更是湖南大学的未来和希望。

自1926年定名“湖南大学”开始，至20世纪50年代，“国文”一直是学校的核心学科，并在全国高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后来院校调整，传统被迫中断。1998年，学校开始筹划重建中文专业，并于2002年正式恢复了文学院的建制。从正式重新招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至今，近十年的时间里，陆续有30余位青年教师加盟。他们大多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博士，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好，因而很快就成为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的主体，并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等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其中不少青年教师，已晋升为教授、副教授，成为文学院的中流砥柱。

当下中国高校的青年教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寒窗苦读 20 余年，好不容易毕业参加工作，就要面临成家、生子、住房等许多现实问题，就要承受教学、科研考核的种种压力，以及同辈人之间竞争所带来的困惑与焦虑，等等。他们的处境确实很艰难。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之下，湖南大学文学学院的青年教师依然没有放弃对专业的挚爱，在各自的领域不断探索，辛勤耕耘，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

为了使这些成果能够成系统地顺利推出，我们特意组织了这套“兰芷学术论丛”。论丛的作者，主要是湖南大学文学学院的青年博士；论丛各书的主要内容，则是他们在各自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后的成果。论丛并未确定一个主题，也不限定规模，只要有成果就出版，越多越好。我希望借助这样一个平台，让湖南大学文学学院的青年教师得以更快成长，使“华实并茂”、“兰芷齐芳”不仅是歌词，而且是事实。

是为序。

郭建勋

2007 年 10 月

于长沙岳麓山之红叶楼寓所

触摸深埋的两难

——刘涵之《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序

刘涵之博士在硕士生阶段是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但在我讲的硕士生“文艺美学专题”课堂上其即兴发言给我留下了印象。那次他对“金利来”西服广告做了文本分析，让我感到他有自己的独特悟性、眼光和思考，直觉是个可造之材。他毕业后到天津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一份人们羡慕的工作。但没想到干了两三年后，他竟来找我诉说想做学问，提出考文艺美学博士生。我由于当年留下的好印象，欣然欢迎。就这样他成了我的2003级博士生。进校后，鉴于他的现当代文学专业以及湖南人出身，我终于破例同意他博士论文选做近二十年来已被做过许多遍的小说大家沈从文。三年学习毕业时，他选择南下回到家乡所在的有“千年学府”之称的湖南大学教书，终于遂了做学问的心愿。我为他的这一选择感到高兴。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很愿意写上几句话。

涵之选择沈从文做博士论文题目，本身就是在甘冒一种学术风险。按今天的学术规范，做博士论文自然要出新，不新不成博士论文选题。这是摆在每位博士生面前的一道必须跨越的难关。但在涵之选择沈从文做选题时，国内外有关的学术著作和博士论文都已不少了，再要创新谈何容易？现在情形下你还能把沈从文打扮成什么新模样？一向内向而沉稳的涵之不轻言放弃，显示了一种在他身上特有的执著劲儿。他通过细心的梳理发现，沈从文研究经历了审美研究到社会文化研究再到跨学科研究的演变过程，其中的一个突出倾向在于，它们基于时代的特殊氛围，大

多集中于对沈从文文学自主意识的探讨上，而对其文学创作复杂的功利性一面则着力不够。在涵之看来，沈从文选择看似自主的乡土书写，恰恰具有不容回避的功利意识：这种书写正是要解决唯美与功利之间的两难困窘。带着这一基本判断，涵之确定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以沈从文的乡土书写为焦点，着重分析其审美及自主面貌下隐伏的功利倾向，探讨显性的审美自主意识与隐性的功利意识之间的关系，集中追问这种关系调节如何在具体的文本叙事中呈现出来。我对这种选题上的创新与探索精神是支持的。

这个题目虽有新意，但难度其实很大，因为关键的问题是揭示审美与功利间的两难困窘如何在小说叙事层面获得解决。涵之的策略首先是，通过乡土书写而回溯乡土意识，摸清作家的写作意图所在。他发现，强烈的乡土意识使乡土书写出现以乡土传统为准绳和无限美化这一传统的态势，以致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的守护，成了诗意描绘的出发点和抵抗现实变迁的支撑力量。在这种独特的乡土书写内部，风俗、风情、风景的回忆与发现，其实不过是出自沈从文在远离故土的情形下抚慰孤独自我的实际的功利需要。而沈从文对当下农村世界因社会变迁导致的人性堕落的批判，则是他不忍心乡村美梦被无情打破的一种主动回应。这种作家功利意图的揭示或还原是大体成立的，对于冷静地解读沈从文有着积极的价值。

涵之认为，要想弄明白乡土书写，还需领会沈从文投寄于乡土书写中的都市批判意识和乡村乌托邦精神，进而挖掘出他内心有关城市堕落而农村醇厚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沈从文何以将人性自然和善良的部分多情地移入乡土社会，而将人性非自然和恶的部分无情地留在城市，以达到类似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种种效用。涵之准确地断言，这一先入为主的做法影响了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和都市书写的叙事策

略，由此，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的意向性处理只能在乡村书写的乌托邦世界得到坚持，这无疑带着一种偏执。同时，他的乡村乌托邦的建立过多地依赖再现性想像（直接后果是创造性想像不足），容易造成闭塞和保守之处。对大家齐声赞誉的大家作这样的“批判”，显示了涵之对于被研究对象的冷峻态度。我以为博士论文作者正需要这种在说“好”中说出“不好”的质疑与探索精神。

涵之在这部论文里还以《边城》、《长河》和《雪晴》集为中心，具体地讨论沈从文乡土文学的叙事技巧及其文化内涵。从涵之的细心读解中可知，沈从文内心的唯美与功利之间的两难困窘如何具体地通过小说叙事显露出来。这是论文的一个着力处。由此进而讨论乡土书写中的情感抉择和困境就顺理成章了。涵之发现，沈从文对文学自主性的看法使得他的美学旨趣带有绅士式的偏执：他一方面反对文学被商业和政治利用，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文学对现实具有不可或缺的修正作用，这说明他的文学功利主义有着含混的地方。涵之明确地指出，这是沈从文乡土书写情感抉择的一个显著特色，但也是它的困难所在。

读完这部论文，我想它的创新意向是明确的。论文从始至终对大家沈从文采取了客观分析而非单纯赞美的立场，着力分析他在唯美与功利之间抉择的两难困窘。这种冷峻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提倡的（当然赞赏性研究也有理由成立）。论文把沈从文遭遇的这一写作困窘理解为现代文学繁复性的一个典型反映，这一结论是新颖的也是中肯的，有助于文学研究者由此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个案。在学界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叫好的时候，这种以沈从文创作为个案进行的冷眼反思，显然尤有必要性和现实价值。同时，论文对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成就和不足做出了具体分析，认为其文学理想的矛盾既有理论建构的矛盾也有其乡村乌托邦建构的矛盾，这两种矛盾的交织导致了沈从文乡土书写与都市书写都有所极化的偏颇，以及相应的叙事策略的选择。我

想这一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论文还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几乎已成定评的结论提出自己的质疑，认为沈从文终止文学创作并非单纯地出于政治生活转换，而是更多地出自唯美与功利间抉择的两难。这一结论准确地触摸到那一向被深埋着的作家内心的精神与生存困境，并同涵之上面的那些观点一样来自具体而细致的论证，我以为是持平之论。我想它们当然不一定“唯一正确”，但毕竟可以同其他学者的沈从文研究结论一样，各持其理而相互共存，从而汇成沈从文研究的多声部交响。

涵之的研究如果有需要自我总结和延伸的地方，我想首先就在加强表述的清晰度和穿透力上。他拥有探索 and 创新的胆识与韧劲，但同时更需要逻辑的严密和语言的清晰及简赅，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抓住对象的内在神理，显豁地亮明个人洞见。同时，既然是研究文本叙事，就可以更多地吸纳叙事学之长而使研究更具细致性和可操作性。我希望这部处女作的出版只是涵之长长的学术清单的第一行，后面的会更多更精彩。

王一川

2008年6月13日于北京

目次

CONTENTS

绪论	1
第一节 沈从文研究述评/1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视角及主要内容/13	
第三节 乡土文学作为沈从文创作起点的必然性/21	
第一章 乡土书写和乡土意识	36
第一节 乡土意识中的自然人性观及其表达/38	
第二节 乡村风俗、风情、风景的回忆与发现/52	
第三节 乡土变迁与乡下人事/68	
本章小结/79	
第二章 都市批判意识和乡村乌托邦精神	81
第一节 都市书写与都市批判意识/85	
第二节 乡村乌托邦的建立/100	
第三节 乡村乌托邦的拆解/116	
本章小结/129	

第三章	生命观和文学理想	130
第一节	情绪的体操：生命的取予形式/132	
第二节	抽象的抒情：文学自主性与文学功能/151	
	本章小结/170	
第四章	乡土书写的叙事形态和文化意识	171
	——以《边城》、《长河》和《雪晴》集为中心	
第一节	论《边城》关于命运的三种叙事/173	
第二节	论《长河》关于社会变迁的叙事/190	
第三节	论《雪晴》集叙事的距离控制/209	
	本章小结/223	
第五章	乡土书写的情感抉择和困境	225
第一节	从现实学习与学习现实/227	
第二节	“乡下人”的身份与绅士式的“沉默”/245	
	本章小结/263	
结 语	265
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279

绪 论

探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精神，首先需要就如下三方面做初步阐述：第一，沈从文研究中的相关状况；第二，本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内容；第三，沈从文选择乡土文学创作的必然性。三个问题虽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但似乎存在一种逻辑前提，回顾研究状况是为了说明本书研究视角设计的出发点，强调沈从文选择乡土文学创作的必然性则是为了直接引入研究对象，以便控制好基于视角设计而产生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沈从文研究述评

沈从文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那时是沈从文创作的成熟期，最富有代表性的评论文字是苏雪林的《沈从文论》（载 1934 年 9 月 1 日《文学》第 3 卷第 3 期）和刘西渭的《〈边城〉与〈八骏图〉》（载 1935 年 9 月 6 日《文学季刊》第 2 卷第 3 期）。苏文主要从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艺术成就来肯定沈从文的创作地位，并认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而他的艺术特色则在于“能创作一种特殊的风格”，“句法短峭简练”，“造语新奇”。此种“永远不落他们窠臼，永远新鲜活泼，

永远表现自己”的特色使沈从文与鲁迅、茅盾、叶绍钧等区别开来而“另成一派”。刘西渭对沈从文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边城》与《八骏图》这两篇不同价值取向与风格的小说上：刘文认为前者是“一部 idyllical 杰作”，后者是一部嘲笑“知识阶级人物”的小说。刘文提出沈从文“是一个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从来不分析”的看法，认为他的作品能给读者烘托出这样一种艺术效果：“他连读者也放在作品所需要的一种空气里，在这里读者不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齐用——灵魂微微一颤，好像水面粼粼一动，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谐合，或者，随便你，一种吸引作用。”与苏雪林和刘西渭形成对照的是，侍桁（韩侍桁）在《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载1931年3月1日《文学生活》第1卷第1期）和《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月下小景〉》（载1934年5月31日《中央日报》）对沈从文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侍桁在前文苛评沈从文“以轻飘的文体遮蔽了好多人的鉴赏的眼”，认为他是“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于低级趣味的作者”；在后文，侍桁以为《月下小景》是复制了佛经故事，“没有很大的成功”，沈从文“从远古的坟墓里虽然搬出一些美丽的尸首”，却“没有能力注射活人的血液使他们重新复活在现世上”。韩和苏、刘的阅读差异也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和京派文人在对待沈从文创作上的最初分歧。沈从文和“左翼”的这种差别也为埃德加·斯诺1936年编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所收附录文章《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妮姆·威尔斯著）发现：“在今天中国创作界，与左翼运动及其外围同时存在的只有几个超政治的中立作家。在当前革命的大动荡中，纯风格作家和‘为艺术而艺术’派是不合时宜，没有多少读者的。他们中间唯一重要的作家是沈从文。他在30年代以前就已经写了四十本书。他是个浪漫主义者，主要是以情节取胜的

作家，并且以具有独特风格著称。”值得注意的是，《活的中国》^① 1936年由埃德加·斯诺编辑在伦敦出版，收沈从文《柏子》并附有沈从文的生平与创作简表。此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沈从文域外接受的开始。

在20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界对沈从文的文学观有过几次不同规模的批判。如默涵《“清高”和“寂寞”》（载1947年2月22日《新华日报》），荃麟《二丑与小丑之间》（载1948年2月2日《华商报》），郭沫若《斥反动文艺》（载《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日第1辑），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载《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日第1辑）。这些文章对作为自由主义文人代表的沈从文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指责沈的作品是“桃红色”的“反动文艺”，并且号召新文艺工作者要和沈绝缘。可以看出这样的批评由于适应当时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学政治化的色彩。

20世纪50~70年代，国内对沈从文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3~1954年出版）、丁易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均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有所遗忘，几乎都把沈从文定性为“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观念中的人物”，是怀有反动的政治态度和文学主张的“新月派作家”的代表。当然，这个时期文学史对新文学成就（包括对左翼以外作家的评价）美学政治化的陈述都是新生政权意识形态领域出于对文学体制重新进行规划、整合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调整和宽松，沈

^①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Edgar Snow, London: George G. Harrap and Co. LTD, 1936. 中文译本《活的中国》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英文材料由文洁若翻译。

从文研究在国内开始复苏。比较起来存在下列几种视角：

(1) 文本研究

受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的启发^①，大陆对沈从文的研究力图修改50~70年代新文学史著述对沈从文的“左”倾式陈述。譬如，1980年《新文学史料》第3期就重新刊载《从文自传》和作者新加的《附记》，南京的《钟山》（1980年第4期）杂志刊载了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论》，广州的《花城》（1980年第5期）刊载了朱光潜的《从沈从文的人格看他的艺术风格》以及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我与沈从文》。这些文章突破了沈从文研究的禁区，引发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用阶级分析模式评价沈从文的反思。后来有一部分研究者沿着这种反思力图进一步发掘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纷纷主张从艺术特色去分析探讨沈从文，而不是用阶级分析法的棒子轻易将沈从文打倒。譬如，吴立昌在《沈从文的“沉浮”与现代文学的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就颇有意义地指出了阶级分析法的研究弊端，以为它忽视了沈从文“对艺术风格的惨淡经营”，只看到沈从文“对左翼文学理论和实践不感兴趣，格格不入”和“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过从颇密”的一面，用“政治唯一”的标准来看待他的文学创作。而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董易《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邵华强《略论沈从文的初期创作》（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① 1961年夏著在美国出版，1979年由刘绍铭翻译在台湾出版。夏这样评价沈从文，“他是现代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艺术造诣上“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及得上他”。司马长风对沈也持这样的肯定态度并进而结合作品细读给予沈从文较为全面的评价。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1975~1978年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后又有修订。

学版》1981年第1期),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载《读书》1984年第8期),王继志《对不合理的人生制度的深沉控诉》(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等文或者为沈从文的“爱”的哲学与“人性”观梳理出清晰的发展脉络,或者阐发沈从文创作对周作人、郁达夫、废名等人的继承,或将沈从文的小说分类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手法,等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类研究无疑起到了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也开了大陆沈从文研究的先河。

汪曾祺和凌宇还写有专文从抒情小说的文体特征来考察沈从文小说的独特风格。譬如,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就将沈从文置于整个现代抒情小说的历史演变和文体变化中,认为抒情小说的源头是鲁迅,经废名、沈从文、萧红、艾芜、孙犁等显现出发生与演变的轨迹,而做出沈从文“完成了抒情小说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的评价。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载《芙蓉》1981年第1期)则从语言风格和文体结构上肯定“沈从文体”的艺术魅力。1985年,凌宇以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将他的系列研究整理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沈从文的重要著述,凌宇主要从作家生平、沈从文笔下的人生视景(包括乡村与都市)、语言与文体等方面阐发沈从文在新文学史上的创作地位。他的这种述论结合的研究思路启发了90年代初期王继志的专著《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贺兴安的专著《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成都出版社1992年出版)。海外的研究,譬如彭小妍1989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Peng Hsiao-Yen, Antithesis Overcome: Shen Ts'ung wen Avant-Gardism and Primitivism,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9.)主要是